

25/2

大理州文史资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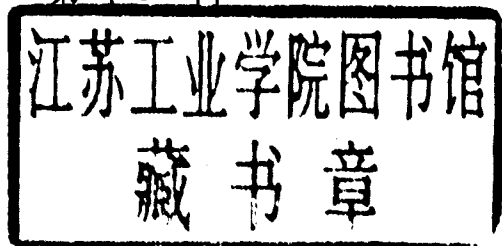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辑



大理州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大理州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
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印

2003 年 6 月

编 审	赵有生	杨培香	姚宋明
	忽绍宽	张树藩	孙珍玲
	李 彪	孙 明	寇铸勋
	欧阳任		
主 编	张应华		
副主编	苏松林		

目 录

1986 年宾川乔甸抗旱见闻	杨永昌(1)
下关人的草根情结和外来户的落地生根	吴 棠(10)
大理市的“四清”运动	李向明(20)
简忆建国初期洱源县的“三大运动”	杜文灿(31)
建国初期鹤庆县的禁毒运动	李 朗(45)
敲锣打鼓走公私合营的道路	马直卿口述 常泽鸿整理(52)
“大跃进”中的一段经历	张秉祥(54)
弥渡县大战钢铁铜略述	自锡霖(59)
大理州政协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座谈会”	
筹备工作侧记	杨永昌(61)
大理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史略	马荣宪(66)
大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概述	李希鳌(73)
解放初期祥云的人民币发行与禁银工作	左繁章(80)
剑川与兰坪之间交通变迁概述	段显明(84)
海稍水库建设始末	杨正荣(88)
剑川木雕发展纪实	段文泽(93)
宾川县八十年市场物价简况	贺大千(100)
南涧县支援漫湾电站建设纪实	鲁国清(105)
苴力倒虹吸跨河拱管	胡 贵(111)
永平县经济开发区与曲硐小城镇建设	罗重高(113)
邓川奶牛的发展	李时达 杨 勇(117)
下山口电站建设及发展	杨正国(119)

改革发展中的永平一中	段永斌(121)
在改革中发展壮大的宾川一中	李 明(124)
宾川县人民医院五十年回眸	周 游(129)
废墟中重新建起的宝华中心卫生院	李 富(133)
永平县人民医院发展纪实	马佐伟(135)
回眸 20 世纪大理地区的文物考古	杨德文(139)
《云龙县志》编修始末	杨宗汉(150)
剑川近代几位名人书著辑目	杨澍先(156)
胡湘其人其诗及其《三鹤图》纪事诗	赵 勤(160)
走向世界的民间文艺家	施新宇(165)
我的体育人生	郭震欧(167)
大理民间圣谕坛纪略	薛 琳(179)
邓川地区的喜庆与丧葬习俗	段 斌(188)
对巍山拱辰楼建设历史的回忆	张文献(203)
巍山衍洋桥	杨 权(212)
蒙化县十个第一	刘伯宽(216)
大理银箔泉	字洪鏞 刘惠媛(218)
天峰山与彝族歌会	张振生(220)

库存资料

游国恩、徐嘉瑞、林之棠三教授洱滨坐眺联吟	周绍文(222)
乡土作家马子华文学生涯略述	杨学程(224)
赵钟奇传略	侯文翰(228)
王懋程传略	张 了(232)
抗日救亡运动在大理古城	赵 铨(237)
追忆抗日勇士赵达源团长	赵国栋(239)

转业支边在下关	冯国真(243)
回忆援藏	李邦治(247)
参与大理专区小学教育整顿改进工作的回忆	张彦光(253)
民国时期蒙化县的基层政权	那泽远(264)
巍山的驴牛运输和小马车	那泽远(269)
鹤庆“城”的变迁记略	潘金华(274)
下关洞经音乐会概况	马直卿(277)
能工巧匠张玉廷	张文献(279)
白族马帮女锅头阿十妹	张 了(281)

1986年宾川乔甸抗旱见闻

杨永昌

1986年3月2日,大理州全州范围内降了一场大雪,多数县出现灾情。中共大理州委立即组成州委工作组,分赴受灾县察看灾情,配合当地党委、政府,组织干部群众生产自救,夺回灾害造成的损失。笔者参加了赴宾川县的工作组,在宾川工作三个多月。前期主要是察看雪灾的灾情,并组织春耕生产,后期则参与抗御多年未遇的旱灾。现将宾川县特别是老旱区乔甸亲见亲闻干部群众团结一致,齐心协力、抗旱栽种、抗旱保苗的壮观场面和动人情景记述于下。

—

进入6月,整个宾川县旱情持续发展,严重威胁着全县的大春生产。6月7日,州委工作组来到全县受旱最严重的乔甸区(当时区还未改为乡,乡未改为村委会,下同),作了10天的旱情调查,并参加了县委、政府在这里召开的全县坝区抗旱栽烟现场会。经过调查,对这一地区抗旱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,还跟干部群众就老旱区如何树立长期抗旱思想,顺应天时,因势利导,采取对策,作了初步探索。6月18日起,宾川县普降喜雨,旱情有所缓和。

乔甸区位于宾川县的最南端,紧靠祥云县,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坝子,祥云清华洞至永胜县公路横贯其中,交通较为方便。全区

总面积 196.5 平方公里,其中坝区面积 44.33 平方公里,海拔 1555 ~ 1800 米之间(指坝区)。由于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和横断山脉背风坡,形成燥热少雨的独特小区域气候条件,年平均降雨量在 600 毫米左右。全区共 6 个乡,22000 多亩耕地,18386 人,其中白族和彝族占总人口的 80% 以上,有两个彝族乡。光热条件好,土地宽广,土质肥沃是这个区的自然资源优势;干旱少雨,森林过量砍伐则是一大劣势,所以被誉为“难得一块宝地,著名的老旱区”。历史上乔甸属祥云县管辖,1958 年修海稍水库时才划归宾川县。为了改变这里十年九旱的面貌,党和政府拨出专款,组织干部群众建成了大量的水利工程,除了全县受益的中型水库——海稍水库外,区内还有小(一)型和小(二)型水库各一件,库容约 400 万立方米;星罗棋布的大小库塘 338 件,为数不少的抽水站和机井;而且通过向祥云县浑水海和小官村水库投工投劳,每年享受一定的“所有制”水方。但因海稍水库处于坝子边缘,本区受益甚微,多年干旱少雨,大小库塘蓄水困难,干旱仍然是农业生产受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,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。

多年的生产实践,旱区干部群众逐步摸索出了一条顺应天时,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,总结了许多抗旱的宝贵经验,培养了艰苦奋斗,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。烤烟这一耐旱,经济效益高,被誉为“晒不死的仙草”的经济作物,被引进大面积栽种,成为本区一大经济支柱,经济收入约占农业总收入的一半左右;将适应低海拔地区的水稻高产良种“桂朝二号”作为这一地区粮食作物的当家品种,也是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的一项关键措施。当然,通过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,合理调整产业结构,积极推广科学种田的先进技术,无疑也是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。

1985 年,对于乔甸区来说还算是风调雨顺的年景,全年粮食总

产 963 万斤,人均 533 斤;农村经济总收入 860 万元,人均 476 元,比上年增加 167 元;种烤烟 12742 亩,平均单产为 298 斤,总产 378 万斤,中上等烟叶占 81%,均价 1.11 元,经济收入达到 422 万元。由于连续两年农业的增产增收,使旱区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,并开始向富裕道路迈进。

1986 年,区委、区公所提出继续努力,再创历史最好水平的奋斗目标 and 增产增收计划:粮食总产 1222 万斤,比上年增 26.9%,人均占有 676 斤;经济总收入 1001 万元,增 16.4%,人均 548 元。主要作物种植计划是:水稻 9300 亩,总产 1041 万斤;烤烟 11000 亩,总产 380 万斤,中上等烟叶要求达到 85%,均价 1.20 元,经济收入 462 万元。干部群众通过分析认为,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条件好,一是水多,全区不包括海稍水库,年初蓄水 550 万立方米,是上年同期三倍多;二是良种、化肥、农药等物资准备充分;三是科学种田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;四是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高,只要努力是可以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。3 月份全区受到霜雪灾害,为了将小春受灾损失在大春补上,全区备耕工作动手早、质量好,水稻育秧 1217 亩,其中 1200 亩是薄膜育秧,良种达 90% 以上,而且都在惊蛰和春分节令内育下;烤烟育秧 630 亩,苗床管理工作认真,完全可以保证计划移栽面积的需要,而且是青一色的良种“红花大金元”。春耕大忙开始前,区委、区公所还就加强服务工作、统一管水用水、抓住增产节令栽种、确保栽种质量等方面的问题,提出了具体的要求,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根据“区干部要下,乡干部要上,村干部要稳”的要求,区委、区公所 35 名干部有 30 名下到各乡帮助工作;23 名乡干部完全做到吃住和工作在乡,并建立了“四簿”,即干部考勤簿、生产进度簿、电话记录簿、伙食登记簿。区乡干部工作上做到分片包干,责任到人,真正深入到村社和群众中开展各项服务工作。区委

还要求区乡干部要在整个春耕生产过程中,除了到各乡村社检查督促,掌握面上工作进展外,还要具体蹲一个乡或村,做好访贤问计,访贫帮富,区领导干部每人 30 户,乡领导干部 15 户。

5 月 9 日开“秧门”后,全区栽种进度和质量都达到预定的要求,但是旱情也一天天发展,春耕生产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
二

1986 年,乔甸区也跟整个宾川县一样,至 5 月雨量特少,仅 20 毫米,不到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。5 月中旬以后,气温猛增,蒸发量加大,大箐小沟自然水断流,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难,加之水库输水渠道过长,渗漏损失大,每亩水稻栽秧和保苗用水量大大超过正常年份需要量。到 5 月底,水库蓄水量不到 100 万立方米(不包括海稍水库),小塘小坝蓄水基本放光。据气象部门预报,6 月份不可能有透雨。旱情持续加剧,不仅使栽秧进度缓慢下来,而且已栽面积保苗困难,部分晒干晒死。据 5 月 15 日统计,已栽水稻面积 7033 亩当中,受旱 4016 亩,干死 410 亩。更为严重的是,前期栽水稻用水多,给后期栽烟造成很大的困难。旱区群众面对保苗、烤烟移栽无水,心急如焚。县委领导在旱情出现后及时赶赴现场,于 5 月 25 日跟区乡干部认真分析了全区的旱情,通过算水账、秧苗账和节令账,提出将抗旱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,动员全区党员、干部和广大群众,全力以赴投入抗旱栽种、抗旱保苗,同时还就抗旱工作的指导思想、措施计划、行动步骤作了认真的安排,在全区掀起了抗旱热潮。

区委、区公所针对全区旱情,明确提出要将干旱造成的损失压缩到最低限度,树立抗旱栽种,抗旱保苗,保为重点的指导思想。首先对现有的水进行统一管理,合理安排,节约使用,将有限的水

真正用在刀刃上,正确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,克服用水上不顾大局的平均主义。其次,正确处理好粮食和烤烟的关系,两者不能偏废,做到平起平坐,并驾齐驱。第三,水稻坚持能栽即栽,不能栽则停,保重于栽的原则,改泡水保苗为湿润保苗。第四,发扬“烤烟栽在肩头上”的精神,动员一切力量,立即行动起来,挑水栽烟。区委、区公所还将这一指导思想和行动计划宣传到千家万户,做到家喻户晓,人人明白,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。

旱情出现后,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等天下雨,无所作为的思想。区委、区公所认为,在贯彻抗旱指导和安排部署意见时,要层层做好思想发动工作,充分相信群众,依靠群众,将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旱力量发挥出来。区乡多次召开现场会,树典型、选样板、牵“带头羊”;召开各种类型群众会二百多次,宣传挑水栽烟;走家串户了解群众挑水栽烟的困难,及时帮助解决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广泛发动,从5月27日开始,声势浩大的万人挑水栽烟高潮已经形成。据当时调查,每天出动挑水栽烟将近万人,当中有74岁的老人,也有5岁的孩子,做到男女老少齐上阵;使用的抽水和运水设备、工具有抽水站13座,机井14口,手拉抽水“小钢龙”300多条,各种水桶8000多对,以及手推车、马车、汽油桶、塑料桶、塑料袋、脸盆、铝锅等;每天上午5时就有人下田,晚上12时还有人挑水浇苗,中午太阳再辣仍坚持平整田块,作好移栽烟苗的准备;运水挑水距离最远的在一公里以上,一小时只能挑1~2趟。很多情况是挑着水上坡,群众生动地称之为“两陡两大”,即坡陡脚杆抖,桶大决心大。初步计算,烟苗从移栽到成活要10天时间,每亩需水1000挑,约40立方米,挑水距离按100米计算,来回要跑200公里,相当于宾川至昆明的一半路程。大罗乡陈家村有29户,165人,出动水桶74对。地处山区的雄鲁摩彝族乡也栽下烤烟150亩,为了

适应山区运水距离远,上坡下坎和水桶放不稳的特点,采用人背马驮,用塑料袋装水,外包麻袋,再用竹箩背。水源缺乏的石碑乡群众,在干河里掏塘打水,挑着一挑算一挑,浇着一塘算一塘,连洗脸洗脚水也抬到烟田里。到6月15日,全区已按质量规范要求挑水栽下烤烟6148亩。群众认为,挑水栽烟虽然吃点苦,但抢到了节令,对烤烟生长和提高烟叶质量也有好处,并总结为:“挑水栽烟流身汗,雨后越长越好看”。

乔甸区干部群众通过一阶段的抗旱实践,丢掉等天下雨的侥幸心理,立足于6月底以前不下雨,作好晴雨两手准备,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。一是下决心保住已栽水稻6000亩,烤烟6000亩,对现有水库水和机井水统一管理,主要用于水稻保苗和挑水栽烟保苗。二是保住“三秋”(稻秧、烟秧、树苗),坚定“留得三秋在,不怕无苗栽”的思想,顺天时,扬地利。根据多年生产实践和科学分析,水稻在夏至、小暑节令内栽下也会有收成,为了保证全区5000多头大牲畜饲草,就是收点草也值得;烤烟栽大苗,留小苗,7月中旬移栽,每亩也会有200多元收入。三是进一步挖掘水的潜力,做好抽水站和机井的检修配套,保证正常运转,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掏塘打井,推广石碑乡经验,将水一点一滴都使用上。四是抓紧翻犁土地,碎好垡,理好墒,打好塘,施好肥,一旦雨水落地就全力以赴栽烟,确保11000亩计划实现。五是做好扩种晚秋,多种多收的准备工作,不荒一亩田地。

三

在抗旱过程中,州委工作组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,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,对老旱区如何顺应天时,无论年成如何,都能做到增产增收进行了深思和探索。

其一,干部群众认为,过去这两年由于“政策好,人努力,天帮忙”,有了好收成,是让人高兴的,一到大旱之年又叫人发愁。宾川县是全省有名的老旱区,就全县抗旱技术装备条件分析,乔甸远远不如其它一些区,干旱持续以来,面临的困难也特别大。但是,乔甸区干部群众在大旱之年,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,发扬艰苦奋斗,吃苦耐劳的“愚公”精神,跟干旱作斗争,栽下保活水稻 6000 多亩,烤烟 6000 多亩,他们靠的是什么?靠的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,靠的是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,真正将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激发出来,创造出奇迹。这种精神在农村深入进行改革的形势下,不但没有过时,而且应该大力提倡、继承和发扬。

其二,老旱区要树立长期抗旱的思想,这在理论上容易接受,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被忽视。由于连续两年的风调雨顺,使老旱区少数干部思想上抗旱的观念有所淡薄,“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”,抗旱设备和工具坏的坏,丢失的丢失,备耕阶段提水设备没有进行认真的检修,输水沟渠淤积和整修迟迟未进行。当年宾川县水库蓄水多,气象部门预报 5 月下旬进入雨季,使整个春耕生产按正常节令考虑得多,对可能出现的旱情在思想和物资上准备不够。如育稻秧和烟苗过份强调一个“早”字,5 月中下旬都进入移栽的最佳秧令;在指导思想有的地区过份强调“先栽秧,后栽烟”,加上少数人存在的“要栽大家栽,要旱人人旱”的平均主义思想,前期大量放水栽秧,不但不留烤烟移栽用水,连水稻保苗水都很紧张,有的根本没有保苗水。随着旱情的出现和发展,原来的安排被打乱,感到束手无策。像乔甸区那样,一旦出现旱情就立即采取应变对策,使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,是值得学习的。如果从备耕开始,在种植计划、物资准备、设备检修、计划用水等方面就作好两

手准备,不管雨季迟来早来都能从容应付,情况就会好一些。如水稻和烤烟育苗时间和面积安排应灵活一些,适当将时间错开,分期进行,富于弹性,一旦出现旱情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,减少保苗的压力。当然,提高老旱区干部素质,增强应变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也至关重要。

其三,老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村工作的一个大课题,尤其是第一层次的调整,即种植业内部的调整应作为重点。从老旱区水少的实际出发,顺应天时,扬长避短,合理调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关系,使有限的水既能确保必要的粮食面积,又能扩大经济作物面积,使群众既能增产又能增收,这应成为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条重要原则。从宾川县和乔甸区的实际情况分析,无论光热、土质、气候、烤煤供应、交通运输、栽培烘烤技术等方面条件,都适合发展烤烟生产,多年的生产实践也证实,不仅能发展,而且能成为稳定的优质烟区,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,解决群众温饱问题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所以,在这类地区,每年一定的烤烟面积应该确保,而且通过提高科学种田水平,逐步提高粮食单产,在总产量逐年增长的前提下,适当扩大烤烟面积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旱情严重的年份,甚至通过适当压缩耗水多的粮食作物面积,增加烤烟面积,使群众在灾年生活上不发生太大的困难。乔甸区干部群众经过反复算账后认为,一亩水稻移栽和保苗用水,可以栽活四亩烤烟;一亩水稻经济收入最多 250 元,四亩烤烟最少也要收入 1200 元。

其四,解决老旱区问题关键在于水,但是等天下雨是不可取的下策,通过生物治水和工程治水相结合,加上科学管水,合理用水,节约用水,最大限度发挥水的作用才是上策。从乔甸区实际出发,生物治水是根本,一是普遍推广以煤代柴,减少森林砍伐;二是植

树造林,封山育林,从树种选择等方面解决干旱燥热,造林成活率低的问题;三是加强林区管理,减少山林火灾,及时扑救,也是一项重要措施。据石碑乡干部介绍,解放前这个乡的崔家营两边森林密茂,山箐水终年不断,最枯季节还能冲起一盘磨,当时群众就靠这点自然水发展农业生产。这个乡干部群众通过吸取山林毁坏,山箐断流的教训,开始重视植树造林。崔家营村 56 岁社员朱明昌,主动进山箐修小水塘,承包育苗,植树造林,绿化荒山,受到区乡领导的表扬和支持。对于乔甸区工程治水问题,应在深入调查研究,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由县水利部门和区公所统筹考虑,认真决策。当地干部群众认为,首先该区再修百万立方米以上水库选址困难,投资也大,短期内也难受益,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通过发动群众一户或联户修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水塘,长藤结瓜,既可蓄水,又能养鱼,一举多得;其次是在充分发挥海稍水库周围抽水站潜力的基础上,采取“民办公助”的办法,适当增建新抽水站和搞一部分两级站,使提水保灌面积由 1500 亩增加到 3000 亩;三是对现有水利设施实行严格管理,完善承包管理责任制,做到责任到人到户,充分发挥效益。

下关人的草根情结和 外来户的落地生根

吴 棠

下关——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，早在汉时就是“西南丝道”（博南古道）途经的咽喉地带，南诏、大理国的雄关要隘。远在公元 739 年南诏从蒙舍（今巍山）进入洱海地区之前，这里就居住着被称为“河蛮”的部族。现今下关北郊荷花寺、大展屯、上村、磨涧一带都是“河蛮”村落。蒙氏逐走“河蛮”之后，沿西洱河北岸筑了一道土城，作为拱卫南诏首都太和城的南面要塞。这座土城叫龙尾城，唐朝樊绰编写的《蛮书》记载：“龙尾城，阁罗凤所筑。”

龙尾城实质上是关隘，文献又称龙尾关，简称“龙关”。以往下关文人多自署“龙关 × ×”，就是说他的籍贯或住地是下关。之所以称为下关，是以大理城（羊苴咩城）为中心，北边的关隘称上关，南边的龙尾城为下关，北为上，南为下，都以地理的方位而定，并无其它含义。

下关人常说的“关迤”、“关外”，是以西洱河为界，河北为关迤，河南为关外；其中又有一片凸出地区称“玉龙关”，20 世纪 40 年代有座阁楼，悬有“百二山河”匾额，楼被火灾所毁。按行政区划，玉龙关仍属大理县，子河桥以南才算关外，属凤仪县。因而民国时期，即 1949 年之前的下关实际是包括大理县的玉洱乡和凤仪县的下关镇，到 1951 年才合并统一为下关市；1958 年并大理、凤仪、下关、漾濞为大理市；1960 年撤大理市建制，分设大理县、下关市、漾

漕县。1983年并大理县、下关市为大理市，下关只是大理市的一个镇，现称下关镇。

历史上的下关只专指今洱河以北，关迤街道办事处和龙泉村民委员会所辖的地区，世代居住在这个片区的人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下关人”。他们的社会结构、文化背景、经济状况、生活方式都与“关外人”不尽相同。

龙尾城既然是南诏、大理国的“南大门”，必然派有重兵把守，从唐代“天宝之战”，到明初傅友德率大军进攻大理，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明初实行“军屯”和“民屯”，从内地大量移民来云南。到大理的这一部分军队和移民，待战事平息后都定居下来。明代屯兵在龙尾城的中央筑了一座砖土小城，周围两里，只有三道城门，无东门。龙尾街是这座城的中轴线，西门现名西门巷，南门正对黑龙桥。这座小城地方文人命名为“槐城”，因居民院中多种槐树而得名。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，三次对城加加固修缮。如今仍沿用的大展屯、刘家营、菜园巷等地名，就是始于明代的“屯”、“营”。古代西洱河蛮的后裔则退居到龙尾城外郊区，成为“民家”人（白族）。

龙尾城（槐城）的居民形成几个大姓的居住地；大井巷、红土坡为苏姓的“根据地”；小井巷为杨姓居多；中丞街、水碓，赵、杨、苏、张、何、石；西门巷、二井，李家、段家、牟家、马家为主；龙尾街王、吴、罗、施、朱、段、李；菜园巷为章姓和樊姓；刘家营则全姓刘。随着各姓之间的通婚和少数外地人的迁入，以上所述仅指“固守家业”而言，例如小井巷也有不少姓苏的人家。其中有几种特殊现象，“张”姓与“章”姓各为一系容易区别；“马”姓按一般说法多是回族，而下关关迤的“马”姓全是汉族，且同姓不一定同宗。例如清咸丰年间进士马恩溥，官至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督学江苏；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下关负责人马骧；民国时期的马崇六